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 延安文艺档案

Y A N A N W E N Y I D A N G A N

## 延安音乐

### 延安音乐家

冯希哲 敬晓庆 张雪艳 / 编著



(下)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 延安文艺档案

主编 王巨才



## 延安音乐 | 延安音乐家(下)

冯希哲 敬晓庆 张雪艳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李焕之



李焕之（1919—2000），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福建晋江人，生于香港。从小接触广东、福建的民间音乐，并在基督教会唱诗班习唱圣咏、习奏风琴。1936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并选修钢琴、合唱等课。1938年8月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又继续在高级班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同时在校任教员。抗战胜利后到张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活跃在音乐战线上，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团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自1954年起，历任中国音乐家委员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音乐创作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主编等职务。1985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2000年3月9日在京逝世，享年81岁。



李焕之在上海国立音专（1936年）

李焕之自幼爱好民间音乐，热心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1935年后，即开始创作歌曲，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蒲风等诗人合作抗日歌曲，作有《厦门自唱》（燕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20世纪40至50年代，共创作了三百余首声乐作品。其中传唱较广的有《青年颂》《民主建国进行曲》《新中国青年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等。他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编配合唱、钢琴伴奏与管弦乐总谱等，还为电影《暴风骤雨》《在长征的道路上》《鲁迅生平》等配乐，为第二、第四两届全国运动会的大型团体操配乐，写作主题歌合唱曲《新长征颂》《红旗颂》。为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他对其总谱进行过多次整理。此外，他还与别人合作了一些作品，如《牧羊哀歌》（郭沫若词）、《黄花曲》（蒋光慈词）等。

几十年来，李焕之根据中国民间及古代音乐的丰富素材，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创作出表现新时代精神而又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深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其代表作有《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合唱；弦歌合唱《苏武》与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以及管弦乐《春节组曲》、箏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箏独奏曲《高山流水》等。他创作的管弦乐曲《春节组曲》现在已成为我国每年新年音乐会上必演曲目，是一部民族交响乐的经典之作。

1957年8月，为了迎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合唱比赛，在刚刚组建一年的混声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吸收了北京一些爱好民歌的青年学生参加，组成“北京青年业余民歌合唱团”。在李焕之、王方亮分别指挥下，合唱团演唱经过改编发展的东北民歌《瞧情郎》、云南民歌《茶山谣》、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古琴曲《苏武》，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郁地道的中国风味，率真质朴的演唱作风，倾倒了在场的评委和听众，因而荣获金质一等奖，这是中国合唱团在世界上的首次获奖。在参赛的曲目中，有两首是李焕之的作品，即四乐章合唱组曲《茶山谣》和在古代琴歌《汉节操》（又名《苏武思君》）的基础上编写的琴歌合唱《苏武》。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李焕之多次向古琴大师查阜西先生请教，并把查先生的唱奏录音带回去学唱、记谱，终于完成了这部忠实于原曲韵味的合唱作品。

李焕之的妻子是厦门同乡作曲家李群，1942年6月两人在延安结婚。李群与李焕之一样，也是多产的歌曲作曲家，作品如《大生产》《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光

未然词)、《放风筝》(根据河北沧州民歌改编)、《茉莉花》(根据河北昌黎民歌改编)、《慰劳红军》(根据江西兴国山歌改编)、《歌唱毛泽东》(根据北京说唱单弦音乐改编)、《快活的买牛郎》(与李焕之合作,根据河南说唱“二夹弦”音乐改编)、《学大寨,赶大寨》《石油歌》(李季词)、《祖国之恋》(卢生词)等。李群尤其创作了许多儿童歌曲,除了独唱歌曲外,如《快乐的节日》(管桦词)、《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杨因词)、《为祖国锻炼》(金波词)、《中华,中华》(瞿琮词)、《快乐的小队》(金波词)、《风筝,美丽的风筝》(柯岩词)、《新年,你好!》(张振芝词)、《创作之歌》(金波词)、《哎呀呀,窗外的小月亮》(欧阳逸冰词)、女高音独唱与童声合唱《摇篮》等等。



### 管弦乐《春节组曲》<sup>①</sup>

自1943年新秧歌运动后,春节就成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互见面、同歌共舞的节日,也成了党政军民相互关怀问候、共同鼓舞革命斗志的时节。《春节组曲》是李焕之用满腔热情以音乐形式对自己当年在延安过春节时的一个真实记录。《春节组曲》创作于1956年,于当年全国音乐周首演,并获得听众一致赞赏。尤其是其中的《序曲——大秧歌》(后常以“春节序曲”为名单独演出)广受欢迎,其已成为中国喜庆佳节中屡演不辍的保留节目。《春节组曲》展现了一幅中国人民在春节时热烈欢腾的场面以及团结友爱、互庆互贺的动人图景,全曲分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大秧歌》:第一乐章为序曲,复三部曲式。这是一段以陕北民间大

<sup>①</sup> 节选自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组编:《交响乐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49页。

秧歌音乐为素材写成的乐章，其中第一主题由两首陕北民间唢呐曲组成，是以民间打击乐节奏为基调的旋律，经短小的问答式过渡，乐曲进入第二主题。第二主题由双簧管奏出亲切而悠扬的陕北秧歌调，不仅体现了热烈欢快的春节庆贺场面，还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乐章《情歌》：第二乐章是行板，是富有浓郁陕北民歌色彩的旋律，乐曲像一首春天的抒情诗。乐曲由英国管奏出引子并带出陕北情歌的主题，听者仿佛看到在月光如水的延河边，青年男女漫步谈心，月光为他们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雾纱。作曲家运用不同乐器的多次反复，好像是让人们感受到男女青年时而深情地交心，时而激情地对答。在一段不平静的起伏音后，音乐回到了主题，最后的乐句仿佛又让人们回到了月光如水的延河边。

第三乐章《盘歌》：第三乐章是回旋曲式的圆舞曲。第一主题表现的是人们在节日中的团结与友爱，除此之外，本乐章还有两个副题，这三部分的音调都是从不同的陕北领唱秧歌调中演变出来的。乐曲的音调时而像朋友的谈心，时而又像老人同青年的幽默逗趣。根据当年延安周末舞会的实际情况，作者还有意将民间风格的音乐与现代交谊舞曲结合起来，将这首具有民族风格的圆舞曲写得颇有新意。

第四乐章《灯会》：第四乐章为三部曲式。主部是以陕北民间队列音乐唢呐曲[大摆队]为素材的音调，乐曲健美壮阔，句法连贯，首尾一气呵成。乐曲运用了陕北唢呐艺人连续呼吸的技巧，反映了灯会上人们欢快的情绪。乐曲最后再现了[大摆队]的音乐旋律，热火朝天鼓乐齐鸣，一副普天同庆春节的热闹景象以音乐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乐队在绚丽辉煌的音响中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

---

### 歌曲《社会主义好》

---

希扬作词，李焕之作曲，创作于1957年。歌曲为进行曲速度，旋律奋发激昂，高度颂扬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它以朴实的语言和直抒胸怀的手法，表达了新中国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从诞生之日起即广为流传，后被选为15首革命歌曲之一，收入《革命歌曲大家唱》之中，教育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思想和成长。

## 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原据大别山歌谣《八段锦》填词改编而成。1929年至1930年间，鄂豫皖苏区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人们改唱《八段锦》以表达苏区人民群众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和第一次分到土地后欢欣鼓舞的心情。因为歌词首句为“八月桂花遍地开”，故名。1959年，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扬把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1964年，李焕之再度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以女声合唱加舞蹈表演的形式出现，一时间此歌红遍全国，最终变成红色经典歌曲。后来，此歌又被选入中小学等音乐教材。

## 琴歌合唱《苏武》<sup>①</sup>

《苏武》，李焕之根据查阜西打谱和教唱的琴歌《苏武思君》编配合唱和民乐伴奏，作于1956年。该曲既保持了古代歌曲的神韵，又发挥男声部深沉、宽厚、坚韧和女声部广漠、凄冷、柔美的特点，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更丰富的艺术手段更充分地去表现作品的精神内涵。从古曲琴歌的角度来说，它除了以原生形态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存在以外，又有了新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从合唱的角度来说，它获得了古老艺术丰厚的滋养，使它具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和神韵，也扩大了它的领域，甚至有可能独树一帜。1953年王震亚教授将琴歌《阳关三叠》编配成混声四部合唱（载1954年第1期《音乐创作》，钢琴伴奏）。近半个世纪以来，成为我国许多合唱团的保留曲目。琴歌合唱《苏武》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演出，得到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

<sup>①</sup> 节录自周畅：《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3页。

## 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sup>①</sup>

1980年，李焕之根据古琴曲《离骚》改编。其成就有三：1. 发挥原曲的精华。作曲家所选用作为主题的音调都是原曲的精华，它精彩、深刻，但在古琴独奏曲中没有得到发挥。如今李焕之调动庞大的民族乐队，用协奏曲的形式，使主题得到充分的展开，使原曲的精华放出光彩，增强威力，给这部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提供了相当的分量。2. 古筝协奏曲的音乐形式。我指的是名副其实的古筝协奏曲，不是名称上的古筝协奏曲。作曲家将民族古曲多主题连缀结构与协奏曲主题呈示、发展、再现的原则糅合在一起，多主题给呈示、发展、再现提供材料，呈示、发展、再现的原则使主题的精华得以发挥。又尽力调动民族乐队和古筝演奏的特长，提高民族乐队的表现力和发展古筝的技法，在协奏的过程中，充分发展乐曲，展示乐曲的风采。3. 幻想曲的音乐构思。屈原《离骚》诗原就是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品，唐代陈康士的琴曲《离骚》也是一部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杰作。李焕之这部作品“幻想曲”，音乐构思高明之处在于：一是抓住了原曲的艺术特征，二是体现了他对欧洲幻想曲音乐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三是作曲家创作的主观意向。这第三点尤其重要。正是由于把它写成幻想曲的协奏曲式，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原曲的精华，才能更深刻和更具有感染力地表现屈原的思想感情和抱负以及人民对他的崇敬、怀念和爱戴，使乐曲具有动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另外，幻想曲可以比较自由地处理曲式结构，给古曲的多主题连缀与主题呈示、发展、再现的原则的糅合，提供某种更为方便的途径。

<sup>①</sup> 节录自周畅：《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页。



## 难忘鲁艺<sup>①</sup>

李焕之：要谈概况，我也只能谈音乐，其他的方面我也不太熟悉。因为我一到延安就到了鲁艺。1938年8月我到了鲁艺，是音乐系第二期。我到了以后，听说第一期也刚毕业不久。也不是毕业，那个时候鲁艺学制叫做“三三制”，就是第一个三个月是第一学期，第二个三个月是出去实习，然后第三个三个月又回到鲁艺来上第二个学期。那么按原定计划应该是九个月才能毕业。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第一学期结业以后，大家就多半到前方去了，到了前方，由于工作需要，一般就回不来了。第一期的，听说也就是八个同学，现在好些同志已经都不在了，像安波、郑律成、李丽莲。李丽莲当时是唱歌的，是个歌唱家。还有的同学可能现在都改行了，不一定搞音乐，不一定在文艺界了。第二期同学就多了，有将近四十个。现在好多音乐界的一些老同志都是第二期的。

李群：他们第二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大堆广东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就说他们是广东佬，像李宁、梁寒光、李鹰航，还有郑波为、叶宁。叶宁不是现代艺术局的这个叶宁，他现在在绥远工作了。另外还有李焕之。

李焕之：都是不同时间从不同的地方去的，但是在一起正好广东人多。第二期的情况现在了解的同志很多。有的情况找李宁呀，找那个王元方呀，他们都知道。第二期，当时我们鲁艺音乐系教员很少，吕骥是系主任，教员就是向隅和唐荣枚同志两个，一共就是他们三个同志。冼星海是11月初来的。二期音乐系，也可以说鲁艺在当时就是延安文艺界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当然另外还有像文抗也还

<sup>①</sup> 李焕之、李群口述，杨劼整理。据廉静、陆华、郭锦华等整理：《我们的演艺生涯》，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94—103页。

集中了不少的作家、文学家，还有些别的文学艺术团，但是鲁艺是集中的。从整个音乐工作来说，那个时候歌咏活动相当活跃，鲁艺的师生都经常出去教歌。那个时候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也提出要求让鲁艺派人去教歌，而且为他们创作校歌。

李群：负责教歌，也给老乡教歌。去给老乡教歌不是单独教的，经常帮助秋收，或是生产，甚至修飞机场，穿插着教歌的工作。

李焕之：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修飞机场的任务，就是在延安城东门外修一个飞机场。当时那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开阔地，老百姓在那里修飞机场。

李群：鲁艺最早是在北门外，在北门外时间不太长，从1938年4月鲁艺建校，到了1939年7月底搬家，有一年多的时间。搬家搬到桥儿沟，要从城里到桥儿沟就必须经过那个飞机场，所以这个飞机场对我们来说熟悉极了。

李焕之：我们都参加劳动，那个时候鲁艺的同学参加修飞机场的劳动，休息的时候教老乡们唱歌。那个时候安波填了很多这种填词的民歌，相当流行。他编了一些民歌，抗战的民歌。编出来教给老乡唱，很容易上口。

李群：鲁艺出来的同学创作的作品都是容易上口，并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李焕之：我们10月底结束了学习，就准备要工作了，正好那个时候冼星海来了。正好是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前一天，第二天就轰炸了（注：此处记忆有误，延安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11月21日，冼星海抵延安是11月3日）。

李群：冼星海那个时候是跟我一块儿来延安的。那时我出去了一下，我再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一个车，那个车是华侨送给毛主席的。

在路上，我不知道他是冼星海，他当然不能把他真实的姓名告诉我，因为一路检查非常严，从西安到延安要过很多的关卡，他这个身份要说出来，当然就不合适了。但是反正组织上当然是知道的。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就是冼星海。他一路也不大说话，我那个时候比较小，对他印象挺深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人挺尊严，又有点儿可敬可畏，老是抽着大烟斗，不大说话。他跟钱韵玲两个人，钱韵玲也不大说话。路上气氛还是相当紧张的。这路上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走到什么地方会出什么问题，都未可知。所以一般都不怎么说话的。当然也许是西安办事处会交代一下，彼此心里有一个了解，但是在路上一般不大解释。

他当时好像带着华侨的身份。我记得很清楚，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咖啡色

的西装外套，然后戴一个咖啡色有花点的围巾。这个围巾就那么一条，到延安他也都戴着，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展览会里头不知道有没有他这条围巾？可能还在。

李焕之：这个围巾可能还在。他那套西装跟这个围巾可能都还在。

李群：他去的时候，就是穿那套衣服，这个印象我是很深。

李焕之：因为他走了以后，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那套西装和围巾都留下了。

李群：他走的时候，我们还送他到飞机场了。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是冼星海。钱韵玲来的时候好像穿着旗袍，头发留得长长的，搭在肩上。

李焕之：鲁艺聘请了他。

李群：他到西北旅社住了没有多久，很快就到鲁艺去了。他到鲁艺去没有多久，正好赶上大批人要到敌后，要到前方，那个时候，总带队就是吕骥同志。

李焕之：到前方还得是半年以后。冼星海是11月初到了延安，到了鲁艺以后，我们第二期同学正好要毕业，所以开欢迎会。欢迎会当场就请他指挥我们唱歌，指挥我们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欢迎会是11月11日）。唱这些歌，大家非常高兴。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很惋惜，因为都要走了。

到前方去的很快已经有个别人走了，但我们当时还留下了一部分人。接着第三期又开始了。第三期一开始我们有一部分留下的少数同学成立了一个高级班，冼星海就担任我们高级班的功课。高级班有我，有李宁，还有梁寒光、李鹰航，还有一个叫周良石。周良石我1961年在青岛见过他一次，沙可夫出事的时候，在追悼会上见到过他一面。他已经不搞艺术工作了。

当时冼星海担任我们高级班的教员，主要是作曲、指挥这两门课。同时很快地组织鲁艺集体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

李群：里诃饰李强，杜矢甲演李老伯，张颖演那个嫂嫂，我就演那个小孩李小兰，干学伟演伤兵，陈锦清演丁二嫂，徐一新演孔排长。演出也有不少场，反正那个时候演出活动挺多的，整个效果没有《生产大合唱》好，后来就搞了《生产大合唱》。

李焕之：一个尝试吧，在咱们中国写这个歌剧，当时也就是不多。

李群：在延安这个算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是《农村曲》，那是向隅同志在第一期的时候作曲的。

李焕之：《农村曲》是第一期的时候，向隅、吕骥同志他们创作的。《军民进

行曲》是1938年12月写的，1939年上演的。大概是1939年二三月份的时候，就写了《生产大合唱》。

李群：实际上按咱们现在来说，《生产大合唱》是一个大型表演唱，实际就是这样，有一点剧情，有一点人物。但是它也不是剧情很复杂，或者是这个人物故事非常贯穿，也不是那样的。基本上就是军民团结抗战，搞生产嘛。里面还搞了好多动物，有牛，有鸡，有鸭，有羊。像我就演公鸡，黄准也是演鸡，牛是叶枫演的，还有一个叫张鲁，他也演牛。陈一宁演的是那个嫂嫂，莎莱是演那个小妹妹。

后来大概有半年吧，吕骥同志就带着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音乐系当中抽调了大批的干部，组织成了一个队伍，出发到敌后去了。我听他们讲，路上打雷，鞋也都没有了，他们说吕骥同志披一件雨衣，也不骑马，就光着脚在地上那么走。那时相当艰苦。但是这支队伍去了以后，文艺干部一下子撒开了，整个敌后文艺的工作，一下就展开了。实际上分出来相当大一部分力量，后来华北联大就是这部分力量。

李焕之：像卢肃、钟惦棐，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出去的。延安音乐上的话，还是放在鲁艺第三期，像陈紫、时乐蒙、白韦、庄映、汪鹏、李莫愁、张衡、张泳，好多人呢，现在也都是在各岗位上，基本上这些同志还都是搞音乐工作的。第三期毕业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就留在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研究室。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差不多都去了。当时音乐研究室，还有瞿维跟寄明。第三期结束之后就是第四期了。第四期是学习最长的一期。

从第三期开始学制就开始长了，第三期改成一年毕业，中间没有实习。因为实习实际上三个月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从第三期就改长一点，让同学们多学一点。第四期是两年。

李群：两年，两年的学期中间也有实习。你像我，我就在华侨工厂待过。

学员不是让你去敌后，是到延安附近；不是出去做音乐工作，是让你做别的工作，等于是接触群众，思想锻炼，一般工作能力的锻炼。这个中间你要做一年工作，它一点都不强调非得做音乐上面的事，我倒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回来继续学习。但是四期实际上也没有按计划搞完，因为那之后就开始整风了。

李焕之：不，其实你们是学完两年以后才出去的，出去以后实习是两个月，

三个月回来就总结，就毕业，你不学习，就不能算毕业了。整风运动开始时第五期刚开了一个头。第五期的学习就不如第四期了，第四期的学习是比较正规化的。那时老师就多了，吕骥同志到前方去了，那么音乐系主任就由冼星海担任了。冼星海担任，向隅同志还在，唐荣枚还在，我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也就担任教学工作了。后来1940年底李元庆去了，张振辅去了，你知道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了，那是一个老音乐家，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他是第一个，他也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所以后来教员力量也增加了，也成立了音乐工作棚，像瞿维、马可、郑律成、任虹。

李群：都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第四期老师就多了。

李焕之：后来担任教学的像声乐的杜矢甲、潘奇、郑律成、李丽莲、唐荣枚他们五员大将，任虹和我担任基本乐课、合唱指挥。乐理主要是我担任，音乐欣赏是向隅。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指挥了。第二期时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里头你只要能干什么，就让你担任什么。当时吕骥知道我学过音乐，我在上海音专读过。因为当时二期学过音乐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1942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1942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歌曲月刊》，《歌曲月刊》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是我一个人干。后来《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歌曲半月刊》，后来又《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

人担任这个《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印刷厂，差不多都是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八九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1939年初成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儿也好，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当时印了一定的记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

可能是到1942年，1941年就开始了，把收集来的许多民歌的稿子进行整理、分类。我们组织了一个编程小组，成员年轻有为，像杜矢甲呀，干学伟呀，把材料分类编一编。后来出了10种丛刊，有《秧歌集》《器乐曲集》《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郟鄏道情集》等，都是油印的。编了民歌集数种，如《江浙民歌》《秦腔音乐》《绥远民歌》《山西民歌》出了好多集。

李群：秧歌运动以后，学习民间音乐就提得很重了。大家都很有自觉，很有感情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李焕之：座谈会开完以后，毛主席还到鲁艺去作一个报告，那是在5月30日。

李群：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让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迈开双脚走到大鲁艺去。这话就是毛主席作报告讲的话。

李焕之：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加注重一些音乐群众活动。就是创作时，更加考虑群众能接受。1942年7月，写了《七月里在边区》大合唱，然后接着1942年10月开始搞一些秧歌了。到1943年春天，秧歌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秧歌运动当时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那个时候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因为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好多正规的课也都不能够正常进行了。有很多的政治学习占了一些时间，所以有些音乐活动就跟工作接不起来。每到一个什么节日，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假如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就搞一些这种作品。吕骥

从前线回来以后不久，赖星就去了。他也去了音乐研究室。他是支部书记，但创作热情很高。

李群：他也写了很多的儿童歌曲。

李焕之：儿童歌曲。林静写的《小毛衣多好看》。

李群：对了，对了。

李焕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打毛衣。

李群：那个时候演出活动简直频繁极了。像我们当学生的，实际上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学习也工作，工作当中也学习了。一个礼拜七天，我的印象当中就总是有五天需要各种不同的活动和演出。

李焕之：当时组织的合唱队，从1940年开始就不光是音乐系的学员，还有音乐工作室的一些同志去参加。一个礼拜只排练几次。

李群：那时候指挥是任虹、时乐蒙，还有李焕之，指挥小组是由这么三个人组成的。那个时候唱的东西还挺广泛的，绝大多数是苏联歌曲。另外也唱我们自己创作的。除此之外，还唱一些30年代的歌曲，像《海韵》《花非花》。

李焕之：还唱一些俄罗斯的，像什么《金色的红岩》。

李群：对，《金色的红岩》的合唱。

李焕之：还唱巴哈的《弥撒》。不是《弥塞亚》，是巴哈的一个《弥撒》。还唱过这些歌。

李群：后来吕骥同志写的《凤凰涅槃》，古老的诗，就是在这儿唱的。我记得好像是郑律成跟李丽莲。

李焕之：郑律成，李丽莲，夏青。

李群：夏青现在改名了，叫祝平康，在文化部，现在他算是办公室主任了。他以前的名字就是夏青。他是很漂亮的男高音，那个时候他是戏剧系的。可能他的声音很好，后来就吸收他唱歌了，唱领唱。整风以后，这个合唱团就没有了，就全力以赴搞秧歌运动了。

李焕之：后来秧歌运动，这种合唱基本上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批判“大远古”。

李群：其实是要怎么看它的。

李焕之：一期，二期，三期，都没有他们第四期接触的东西多。

李群：那时候人家说我们正规化，所以后来批判的时候，也集中在我们这儿了。音乐课，我们基本上都是唱固定的唱名，听也是固定的，唱也是固定的。

那个时候音乐系并不分科，就是大家都要上这些课，都是一些共同课。举个例子吧，像基本的音乐课，我们都是五线谱，唱固定的唱名，都是他们给我们编讲义，课呀、唱呀什么的，就是不分科。但是同学本身，他无形中好像有那么一个分法。有的同志，他提琴比较好，就多下点工夫；有的同志他声乐比较好，也有兴趣，他在这个方面就多下点工夫；有的人就是喜欢搞作曲，他就在这个方面多写一点，多下点工夫。所以在无形中好像张三李四他自己分了，但是课本身并不分，门门课都上。指挥呀，合唱呀，欣赏呀，和声呀，作曲呀，声乐，全部都得上，实际上就是说不喜欢哪一课吧，大家也知道，但是你也别不上，稍微偷一点懒。

李焕之：那个时候不可能不全面，因为你毕业以后出去，要担任很多方面的工作。

李群：我也唱，我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慢慢就不能唱了。当然我以前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还唱了不少。

最初我们搞秧歌的时候，思想觉悟还没有那么高。好像觉得要学，甚至耳朵上还搞一个大辣椒。大家其实觉得这些东西趣味并不高，但是后来慢慢艺术性也好，思想性也好，群众化也好，都有所提高。实际上展开它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认识、学习、提高的过程。当然到了最后比较集中的比如像《白毛女》这就是比较大的成果。当然了像秧歌剧很多了，像《夫妻识字》《兄妹开荒》这都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在想一想，最初搞秧歌时候也很有意思的。就像我说的，翻穿一个皮袄呀，或者耳朵上搞一个大辣椒呀，都有的。后来像刘炽那个《胜利鼓舞》，它发展在腰鼓基础上，一下子找几十个个子最高、身体最魁梧的男同志，然后搞一个大的腰鼓，系上一个红带子，我的印象是头上都包着的，穿的毛蓝那种上衣，是红的腰带，大概是那样的。哎呀，看起来精神面貌那就完全都不一样了，不完全是原来民间的东西了。

我们去演出的时候，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们演多少场，他都跟着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后面跟着一大堆老乡，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然后在一个大场子，

周围是山坡，就等于咱们现在这个体育馆似的，人山人海，山头都坐满了人，特别有意思。甚至他们把我们送回来，都不嫌累。

李焕之：在农村演出都是这样。都是野场子，都是露天演出的。我在延安搞创作多半写合唱。我到延安去，第一首作品还是在延安院子里写的，是叫《保卫祖国》的一首歌曲。带到鲁艺以后，吕骥看到了，他觉得这首歌不错，让我继续写，所以从那开始又搞曲子，搞指挥。《保卫祖国》这个歌，词作者是金帆。我跟他是在香港的时候认识的，他在广州，我在香港。我们通信来往合作，但没有见过面。《保卫祖国》吕骥改了几句，经常在晚会的时候唱。从那以后我经常写合唱，《青年颂》《青春曲》《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抗战进行曲》《十月革命进行曲》《鲁迅纪念歌》。

李群：《青年颂》是胡乔木的词，这歌唱了相当长的时期。

李焕之：他写的一首诗，发表在当时的一个青年刊物上。

李群：这个合唱篇幅比较大。

李焕之：后来又跟贺敬之合作了歌颂党的《红旗的歌》，当时是中共成立20周年，就写了中共20周年。本来他是写一个大合唱，因为大合唱我们好几个人分头去写了。我是写了两首，一首是纪念歌，就是中共成立20周年纪念歌。现在我把它改成《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改成这个名字。马可写了《毛泽东之歌》，瞿维写了《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分头写，但是没有写完。他的那个大合唱可能还有一两段没写，但是都在各种场合里演唱了。

李群：因为是比较正规的合唱，篇幅也都比较大，所以一直都是合唱队在唱。

李焕之：那个时候写合唱还是有风气，当时像冼星海去以后写了《黄河大合唱》。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合唱还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建立合唱队，也就是说让这个合唱队正规一些。

李群：人家《国际歌》四部都能背得下来，《黄河大合唱》女高音、女低音都能唱。

李焕之：当时合唱的确很能够鼓舞人心，很快流行起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段落，像《保卫黄河》很快就传开了。延安那时有一个习惯，一开大会大家就互相拉歌。

李群：你要说这个场面，我都觉得将来拍什么电影要把这个场面再现一下，那是很感动人、很有激情的，人山人海，歌的海洋，一浪胜过一浪，真的是这样。